

美国自二战以后外交政策,曾经深受建构主义理论影响,主张引导各国精英对待国家/国民课题的论述,包括影响地方华人等少数民族的定位,以利建构当地民族自我认知以及对美文化交流,如此思想也影响过各地华人研究。加上一些国家经历过战乱,还发生过反华排华以及长期对待汉字的白色恐怖,上个世纪出现过一些基于西方理论或符合各国政治主流观念的书写,不见得全面或正确,而各地方华人社会当年留下的文献也未必是畅所欲言的忠实记载,事实上有许多言犹未尽或曲笔。这一来,从南洋华人到南洋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有许多貌似早已定论或者常识性质的课题,其实都可以重新开启新的研究方向。

(作者系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道教学院董事会主席兼院长、教授)

刘永华:闽南历史研究的四个视角

对闽南文化的探索,离不开对闽南历史的重构,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个区域的闽南,还是这个区域不同人群践行与传承的文化,都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与演变的。本文就闽南历史的研究视角,略陈己见。笔者认为,要推进对闽南历史的探讨,应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力求从地域、区域、中国与全球四个角度,对闽南历史进行研究。

一、区域。我们常不假思索地把闽南视为一个区域。但事实上,一个人文地理单元的形成,并非自然地理单元的自然延伸,而是人类互动或建构的结果。因此不妨从实、虚两个层面,讨论闽南成其为区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要讨论闽南何以成为一个区域,应考察古今闽南区域内不同地域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联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一个人文区域的出现,还可能是有意识的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应考察闽南作为一个区域在文化上被建构的过程。同样,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演变过程,也可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探讨。

二、地域。作为一个区域,闽南有自身的中心与边缘。比如九龙江下游地区,唐宋以来就是漳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明清时期,这一带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充满活力,曾在土地制度、宗族组织、民间结社等方面出现过制度创新,对这一地域的研究,可洞察近世中国社会的某些发展走向。而漳州与潮州、汀州的毗邻山地,属于所谓的“内陆边疆”,这些地区多半在明中后期设县,社会经济开发相对较晚,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对这一地域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明清王朝对内陆边疆的经营及当地社会因应政治、社会变动而采取的策略。

三、中国。探讨闽南历史,离不开大历史的背景。闽南很早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此后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逐渐对民众生活带来越来越深的影响。泉州、月港等港口的兴衰,都与朝廷的海洋政策息息相关。明初推行的里甲制度和卫所军户制度,对闽南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清初迁界和清军与明郑之间的拉锯战,也对闽南社会经济影响很大。因此,不少闽南的历史问题,必须置于整个中国的脉络中进行理解。

四、全球。由于地处东南滨海地区,闽南不可避免地与海洋和来自欧亚各地的海上势力经常发生联系。中古泉州港、明代月港的兴起,是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人的东来分不开的,尤其是16世纪欧洲、南美、亚洲的贸易航线的开辟,将闽南与欧、美联系起来。在海上讨生活,与海外政治、经济与军事势力打交道,是历史上闽南沿海民众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联系全球历史的变动,闽南历史一些议题就无法得到深刻的理解。

上述四个研究视角,各有其特色:地域史、区域史擅长进行细部分析,重构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过程;全国视角适合进行制度史、思想史、精英人物等的分析;全球史的专长是对人、物、观念进行跨社会、跨文明的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可根据问题的需要确定视角,同时尽量做

到几个视角的配合,联系不同层面推进对闽南历史的探索。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牛建强:闽南文化研究的三个基点

从事中原文化研究,自然希望获得华南文化的比较资源。闽南文化是华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且有自己的特色。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举办闽南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展望研讨会,本人有幸获得这次了解和学习闽南文化的机会,所以对会议主办方闽南文化研究院的邀请由衷地表示感谢。之前,曾学习了前贤关于闽南文化探讨的论著,结合自己对原始材料的接触,在三个方面提出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闽南文化研究的方家。

一、区域界定。闽南区域和闽南文化区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闽南区域是实际的空间概念,而闽南文化区域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与空间有关,但又超越空间之外。以明清时期的行政分界为基准,狭义的闽南区域指的是泉州府、漳州府,同时本人也倾向于把北面的兴化府和南面与福建漳州府邻接的广东潮州府也划入这个相对狭义的分区之内。我们知道,历史上包括省、府、州界限的划分是兼顾其历史文化传统和山川自然分隔等要素的,而这种分界又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分区间的差异性。但是,因为壤地相接的关系,也为邻接地区地缘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因此它也有可能突破较为重要的区划限制而形成一体的文化特征。比如,广东潮州府和闽南区域的关系即是如此。

随着地域开发步伐的展开,闽南文化奠基于唐宋,到了明清时期达至繁盛,早已摆脱了唐之前蛮夷之区的特征,进入和国家统治核心区没有太大差别的王朝体系之中。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沿海渔业和海内外贸易的发达,在明英宗天顺时即很活跃(如叶盛任两广巡抚时在奏疏中所提及的情况)。嘉靖时期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异常兴盛,到了隆庆时期,漳州府月港(海澄县)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万历初期,由于倭寇问题介入,使正常的开海贸易受到阻滞,因海外贸易惯性力而形成的畸形海盗现象成为困扰闽粤地区重大的社会问题。地区文化发达,科举人才大量涌现,造就出许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如蔡清、张岳、王慎中、李贽、郭应聘、李廷机、黄道周、郑成功、李光地等。

一旦文化相对形成,它就具有向周边和遥远地区传播的能量。其具体传播方式或途径通常是和移民联系在一起的。在明末,随着郑氏集团势力的扩展,大量闽南人群迁移到台湾地区,到了清康熙二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台湾收复,台湾府成为福建省一个组成部分,闽南人口移居台湾者达到高峰。这样,闽南文化逐渐在闽南之外的地方扎根、传播,也随着海外贸易和闽南华人华侨在东南亚等地区的定居,将其生活、信仰等文化种子播撒到那里。

因此,闽南区域和闽南文化区域是两个相异的概念。做这样的区分,一则要求首先立足于闽南空间区域的深层的和系统的研究,二则还要注意到这种文化的传播,观察和捕捉这种文化的影响范围。这样,对于闽南文化的研究便可明确其研究的先后序列和侧重,即首先是空间区域内的广义文化,即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进而扩及台湾地区闽文化和海外闽文化的研究。

二、资料基础。进行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深化研究,都离不开资料的积累和建设。这既是研究的基础和先行,也是文化研究的构成部分。

陈支平教授及其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也提供了范本。他主编了“闽台族谱汇刊”(共50册),2009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汇集赵、李、吴、王等姓氏家谱106部,收录最早的族